

日本漢學叢刊

明治的漢學家

著者／町田三郎
譯者／連清吉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町田三郎著

連清吉譯

明治的漢學家

臺灣學書局印行

明治的漢學家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2 [民 91]
面；公分

ISBN 957-15-1162-5 (精裝)

ISBN 957-15-1163-3 (平裝)

1.漢學－日本

033.1

91021875

明治的漢學家 (全一冊)

著者：町田三郎
譯者：連清吉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孫善書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戶：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〇二)二三六三四一五六
傳真：(〇二)二三六三三三四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studentbook.web66.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刷所：宏輝彩色印刷公司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二二二六八八五三

定價：精裝新臺幣四二〇元
平裝新臺幣三五〇元

西元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初版

03301

究必害侵・權作著有

ISBN 957-15-1162-5 (精裝)

ISBN 957-15-1163-3 (平裝)

明治的漢學家 目次

明治漢學史論

I 明治時代の漢學

明治初年の中國遊記(一)——竹添光鴻《棧雲峽雨日記》	二九
明治初年の中國遊記(二)——岡鹿門《觀光紀游》	五一
清朝首任長崎領事余元眉及其書簡	六九
重野成齋論	九五
島田篁村論	一〇三
岡松甕谷論	一一一
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諸子	一四一
西村天囚論	一六七

服部宇之吉及其所編輯的《漢文大系》

二〇九

《漢籍國字解全書》

二三五

井上哲次郎及其日本漢學的三部著作

二五九

Ⅱ 明治・大正・昭和的漢學

林泰輔與日本漢學

二七九

遠藤隆吉論

三〇三

跋

三五三

明治漢學史論

(一)

明治四十多年的學術是日本思想史上值得注目的時代。關於「漢學」的推移轉變，大抵可區分爲以下四個時期。

第一期 明治元年——十年初

漢學衰退與啓蒙思想的隆盛

第二期 明治十年初——二十二、三年

古典講習科與斯文會的活動

第三期 明治二十四、五年——三十五、六年

東西哲學的融合與對日本學術的注視

第四期 明治三十七、八年以後

中日學術的總合 《漢文大系》與其他

(二)

在江戶時代所謂學問即是漢學；明治時代則以文明開化，即全盤西洋化為學術的主流。因此隨著時代由江戶時代推移至明治時代，漢學不但成為只是和（日本）漢（中國）洋（西洋）學問的一個分野，而且也被世人視為陳舊落伍不合潮流的學問。即使要有教養，即識字能文以優遊於現代新社會，漢學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如明治初年各地「寺子屋」（寺廟設置私塾以教授學子）流行繁盛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但是一般人依然認為漢學不再是領導時代，順應潮流的學術主流了。換句話說，只有歐洲的學問才是時代思潮的主導。

幕末著名的昌平黌教授安井息軒與中村正直二人的人生哲學，在明治初年被認為是兩極化的模式。簡而言之中村正直是西洋新知識的啓蒙；安井息軒是保守反動而頑冥不靈的老人。

江戶時代末年，幕府派遣十二名留學生至英國研究西洋學問。中村正直奉命為留學生的監督，於慶應二年（一八六六）動身到倫敦，預定停留五年。在中村正直去英國之前，其所接受的教育是英俗貪奸、英人奢靡嗜酒；而科學技術先進。但是「前年遊學英都二載，察其風俗，以知其不然。」（《西國立志編》序）即留學以前所抱持的英國觀，在實地考察以後，完全改觀了。

由於幕府崩壞，突然奉命回國。回國後立刻着手撰述《敬天愛人說》，探究歐洲本質。就內容而言，此書並未必圓熟，所探討的依然沒有超出中國傳統天道說與理氣說的範圍。越

二年，撰寫《請質所聞》，中村正直的思想就逐漸接近基督教的教義，承認上帝的存在。

明治四年，九州伊萬里的基督教徒六十七名被逮捕，進而引發了外交問題。由於此事件的發生，中村正直以匿名的方式發表了〈擬泰西人上書〉一文。文中指出：西洋各國之所以富強的原因，乃根源於基督教信望愛的精神，這也是構築歐洲文明的根基所在。日本若要躋身於近代國家之列，則宜模倣歐洲，承認基督教的存在，進而體認其精神。因此天皇陛下不妨以身作則，首先受洗成為基督教徒。即使是假借洋人之名而上書，也頗見其果敢直諫的膽識。在明治七年聖誕節的早晨，中村正直正式接受洗禮。^①

明治以來，安井息軒始終與基督教對抗，其於明治六年刊行《辨妄》一書。時年七十五歲。明治新政府成立了六年，政治情勢逐漸穩定，同時西洋文明也滔滔不絕地湧入。安井息軒以為西洋文明的根源就是基督教，而基督教的根本精神就是萬人平等。然而萬人平等的觀念是否合乎日本的國情，則有深思的必要。安井息軒埋首精研的是東方經典，而東方經典所揭示的理想世界是階級秩序整然不亂的社會；並非以平等為究極的世界。至於主導人間社會的是鑽研經典且有道德的傑出才俊。換句話說是士大夫所支配，即以人為主的社會而不是以神為第一義的世界。這是儒家的思想也是安井息軒所堅持的信念。

① 有關中村正直的事蹟，參考拙著《鹽谷宕陰と中村正直》（收載於《幕末明治期における明清天主教關係漢籍の流入とその影響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文部省科學研究費的成果報告書，代表者、柴田篤，1993年3月）。

安井息軒徹底研究《聖經》，也確信自身所抱持的世界觀與基督教有明顯的差異，乃以老儒者弘毅道遠的職志，撰述《辨妄》一書，對基督教展開激烈的批判。

《辨妄》由島津久光的序、五篇論說、「鬼神論」與「共和政事論」構成。其主旨在批評舊約聖經中創世紀神話的荒誕與新約聖經四福音中有關耶穌基督事蹟的虛幻。安井息軒是以科學實證的理性主義檢證《聖經》的各項記載，這是安井息軒所貫徹的立場。例如安井息軒以爲中國的神是不具形體的；基督教即是人神同形，這是中西顯著不同的所在。又有關原罪的問題，安井息軒以爲「凡生物，蛇最狡，則如不造之。何爲又造蛇，使之誘夏娃，食其所禁之果也」，即抱持人類最原始素樸的懷疑，以質問《聖經》故事的矛盾。又自然界雌雄牝牡的結合是天理之常，何罪之有。假使夏娃果真有罪，何以夏娃所犯的罪過，要後世的婦女來贖罪，而受妊娠生產之苦。

《辨妄》是以理性主義批評《聖經》故事的論調貫穿全書。雖然如此，安井息軒的見解之受到批評也是必然的。有人以爲無論《新舊約聖經》都是宗教的書而非歷史事實的記述，如果要批評，也應該從「宗教」的角度立論才是。晚於安井息軒十年的山路愛山說：當時的傳教士都認爲「聖經是神的示授，一言一句皆無誤謬」。從山路愛山自身的經驗談，可以知道明治以來，一般人以爲《聖經》所代表的西洋文明是有無可置疑的權威性。而安井息軒與基督教所作的批評，則是正面折衝的論爭，也代表著一介儒者本著東洋文化的執着而對抗滔滔東來的西洋文明。因此山路愛山推崇安井息軒的抗爭是「以日本尚古思想批判新信仰而最有智慧的」，其《辨妄》一書是當時的「非凡之傑作」。雖然如此，當時歐洲文明至上的青

年學者依然認為安井息軒的議論無非是「無用之觀」。^②

探究安井息軒之所以撰述《辨妄》的旨趣，無非在質問：東洋的傳統思想為何不可適應於今日；西洋文明不合理的所在比比皆是，未必能毫無選擇地全部吸收。再者東洋與西洋原本即不能一體化的，因此，西洋文明是不能適用於東洋的。

(三)

明治初期有兩個日本人先後到中國旅行，且分別用漢文撰寫了中國遊記。由於二人的漢學造詣極深，漢文流暢綺麗，因此出版以後，佳評如潮。首先是明治九年到中國西北部旅行而撰寫《棧雲峽雨日記》上下二卷的竹添光鴻。其次是明治十七到十八年，以上海為中心，遊歷中國東南部而撰述《觀光紀游》十卷的岡鹿門。由於兩個遊記相隔了八年，其間日本的國內情勢與中國的國際局勢產生極大的變化，即使二人都接受漢學的薰陶，對當時中國的觀點却有極大的差異。

竹添井井、名進一郎、字光鴻、號井井。天保十三年（一八四三）出生於九州的天草。及長，學於熊本木下犀潭的門下。同門有井上毅、古庄嘉門、岡松甕谷。其後仕宦於熊本藩。

②

見山路愛山《基督教評論》（岩波文庫、頁二〇—四三）。又、有關安井息軒《辨妄》的論述，參考拙著《安井息軒覺書》，（《東方學》72、1986年7月）。

幕末擾攘之際，奉藩主之命奔走京都、江戶。是時結識勝海舟、安井息軒。明治維新後，在玉名開設私塾。明治八年在勝海舟的推薦下，擔任特命全權公使森有禮的隨員，渡航清國。首先任職於天津領事館，不久即轉任北京大使館書記官。就在此時，在同鄉的津田君亮、中國人通譯侯志信伴隨下，竹添光鴻裝扮成喇嘛僧侶，從北京出發，開始遊歷憧憬已久的中國風土。竹添光鴻說：

明治八年乙亥十一月、余從森公使航清國，駐北京公館數月。每聞客自蜀中來，談其山水風土，神飛魂馳不能自禁。遂請於公使，與津田君亮以九年五月二日治裝啓行。即清曆光緒二年四月九日也。

中國之遊最令竹添光鴻心醉的是蜀地的風物，尤其是秦棧蜀道的奇險。竹添光鴻一行三人由北京出發，經保定、石家莊、邯鄲、孟津到洛陽。再西越函谷關，經華陰到西安。而後翻越秦嶺，經南鄭、劍閣、成都到重慶。飽覽四川風光之後，下三峽，遊洞庭，順流直抵上海。行程凡九千餘里，前後一百二十日，於八月二十一日抵達上海。

明治初年的中國旅行並不舒暢。離開北京一個月，旅館沒有衛浴設備，沿途也未必有固定的廁所。到了驪山、西安才能入浴如廁，「雖不淨潔亦勝於無」（五月三十一日），也稍可解除旅途的勞頓。再者金錢屢遭詐取，而且飲食也極為粗略。雖然如此，竹添光鴻的遊記中幾乎沒有記載這些不便與勞累。或許竹添光鴻以為即使發洩牢騷亦無補於事。《棧雲峽雨日

記《所洋溢的是

抵興寧縣，爲漢槐里茂陵之地。獲藕粉食之。蓋搗藕爲粉，漬水曬乾如我邦製葛粉。過馬嵬坡，楊太真墓在道右，一隴僅存，有祠蕭然。是日遙望見終南山於煙靄間，蓋陝西山脈，自甘肅西傾而來，爲隴爲岍，據秦寧鳳漢之會。分爲二支，其一東北出，踰鳳翔爲岐山、爲梁山，又東爲九峻，又東北爲甘泉、爲嵯峨，又東爲荊，其尾爲朝坂，以盡于河，皆在渭北，關中人謂之北山。……宿長寧驛。（六月四日）

渭水二分陝西山脈爲南北的記載，似乎沒有特別的感興湧現，但是竹添光鴻此時的心境未嘗沒有自己是近代日本史上，第一個親見耳熟能詳的華山、終南山及渭水的自豪與欣喜。更何況所見所聞都是新鮮而足以驚嘆的，只是竹添光鴻抑制自身的情感而作客觀地敘述而已。因此親見遊歷日本人神遊已久的秦都咸陽、唐都長安，攀越奇險的秦棧蜀道，探訪成都的杜甫草堂，內心無非是充滿著欣喜與感動。歷觀憧憬之地，發思古之幽情而得以一償宿願，即使旅途中有些許的不便，也不在意了。

《棧雲峽雨日記》以抑揚頓挫的方式，於字裏行間表達出竹添光鴻探訪中國的欣喜。探究其思想的根底，乃是對中國悠久文化的憧憬。日本大多數的文人也抱持著相同感受。《棧雲峽雨日記》就是敘述了日本知識階層的心聲，因而廣受閱讀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明治十七年，岡鹿門以上海爲中心而旅行了華中與華南一帶。其見聞收錄成《觀光紀游》

一書，於十九年出版刊行。岡鹿門、名修、字天爵，天保四年（一八三三）生於仙台。及長，學於江戶的昌平黌。同門受業的有重野成齋、中村正直，特別是與松本奎堂、松村飯山有深厚的交往。明治維新後，有一段時間曾擔任東京圖書館館長，其餘大部分的時間，則以在野文人的身分活躍於當時。大正三年卒。著書有《尊攘記事》、《藏名山房雜著》。

《觀光紀游》共十卷、記載明治十七年五月自橫濱出發，翌年四月歸國，前後三百十五天的中國見聞錄。

岡鹿門旅遊中國的目的是爲了探訪中譯《普法戰紀》的王韜（紫詮）。王韜曾於明治十二年東來日本，而結識了岡鹿門。岡鹿門說：「是游擬航香港見王紫詮，而後歷游四方。會紫詮書告移居滬上，乃航上海。」（《觀光紀游》卷一序）到達上海，問此地名士爲誰，咸謂「王君紫詮爲第一流」。但是與王韜再次見面後，岡鹿門極端失望。王韜不但了無往日飛揚的神采，筆談中也經常稱說頭痛而告退。垂問岸田吟香，才知道王韜當時已經是鴉片中毒了。

（岸田）吟香來過。余曰目下中土非一掃烟毒與六經毒則不可爲也。六經豈有毒乎，唯中人均泥末義，墨守陳言，不復知西人研究實學。發明實理非爛熟六經所能悉。孟子不言乎，盡信書不如無書、六經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若不信其可信者，而信其不可信者，則六經之流毒，何異老莊之毒宋魯。吟香擊案爲名言。（八月二十二日）

岡鹿門以爲鴉片的毒害與「六經之毒」並爲中國的禍害。至於科舉的爲害更深，岡鹿門議論

說：

方今急務在興州郡鄉校、講格致實學。與建海陸兵學校、講火器航海諸業，抑亦末也。絕大急務在一變國是、廢科舉、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習，振起天下之元氣矣。（十二月十二日）

岡鹿門旅行中國的同時，也憂心中國的現狀，進而敘述改革要略。在天津時，由於朱舜水的後裔朱舜江的引介，會見道台盛杏蓀，又在盛氏的引見下，先後於十月十日、十一月二十三日照見了當時的總督李鴻章。岡鹿門向李氏提出了自身的見解。是時適逢法國進軍福州、基隆，清軍束手無策而敗戰。因此，李鴻章也感嘆國內政治體制的欠陷與軍備的落伍。

竹添光鴻的《棧雲峽雨日記》是以中國山川風土與自然景觀的描寫為主；岡鹿門的《觀光紀游》則在議論當時的政治與局勢。竹添光鴻屢受中國的風物所感動，岡鹿門外甥濯的〈鹿門墓碑銘〉記載著：「先生（鹿門）之談及於東亞之大勢，極論善鄰之說，且說吸烟與科舉消耗國力之甚」，可知岡鹿門的關心是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為何二人的觀點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其一在於二人年齡、性向才情、身分立場的差異。竹添光鴻三十五歲，岡鹿門五十歲。竹添光鴻是文人氣質；岡鹿門則是政論家。竹添光鴻是外交官；岡鹿門則是在野的處士。其

二是竹添光鴻旅行的明治九年與岡鹿門旅行的明治十七年的八年的歲月中，中日之間的關係有急劇的變化。維新動亂的平定，穩定政府的樹立是在明治十年「西南戰役」結束以後。此時國內不平分子肅掃一清，政治體制漸趨安定。明治政府逐漸轉變為亞洲中的歐洲式強國，進而自許為亞洲唯一的近代國家。政策性的目標則指向亞洲其他落後的國家，特別鄰近的中國和朝鮮。竹添光鴻旅行的時候，新政府的內部尚有不協調的現象，即積極於國內體制強化的時期。此時一般日本人都認為清國不但國土廣大，也是擁有三千年歷史的先進國家。至於接受漢學教育的竹添光鴻更抱持著中華文明絕對優越的看法。

岡鹿門旅遊中國的時候，正是法國侵略南海港灣的時期。就在此一時期，明治政府也模倣歐洲列強的手法，軍事介入李氏朝鮮的內政。在最新線指揮作戰的是昇任公使的竹添光鴻。明治十七年十二月，竹添光鴻率領日本軍隊侵入朝鮮王宮，由於受到清軍的反擊而退守濟物浦。此即所謂的「甲申事變」。翌年，日清兩國簽訂天津條約，協議同時撤去在朝鮮的軍隊。由於此一條約的簽訂，在政治上，日清兩國已經立於平等的地位了。從此以後，日本朝野的中國觀也有了極大的改變。甚至於自認為是首先邁向近代化的先進國，對中國的觀感也產生由充滿憧憬嚮往而轉為示範指導的優越感。《觀光紀游》的例言如是寫著：

是書間記中土失政弊俗，人或議其過甚。余異域人，直記所耳目，非有意為誹謗。

他日流入中土，安知不有心者，或取爲藥石之語乎。^③

(四)

活躍於幕末的漢學者，到了明治十年前後，都相繼地逝去。門田樸齋於明治六年、鹽谷簀山、三上是菴於七年、安井息軒、關藤藤陰於九年、山田方谷於十年、林鶴梁、春日潛庵、大槻盤溪、芳野金陵、池田草庵於十一年死去。雖然其秀出的弟子或長壽的漢學者依然健在，如重野成齋、中村正直、川田甕江、島田篁村、三島中洲、東澤瀉、木下犀潭、岡松甕谷等人即是。但是以松崎慊堂、安井息軒爲中心的幕末漢學隆盛的景象已經不再，代之而起的是歐化主義至上的潮流。中村正直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此時棄漢學如土苴，漢學者或有不堪鬱憤、不平之餘而入海至死者。」^④

明治十年東京大學設立。於文學院設置了和漢文學科，企圖振興衰退的漢學，維繫日本傳統的學問。但是考察其課程基準，兼修英、法、德等外國語文是學生的義務，相對地必修的和漢學的課程設計則極其粗陋簡略。甚且此時東京大學的所有課目全部都用英語講授。在

③ 參考拙著《〈棧雲峽雨日記〉與〈觀光紀游〉》（《陳奇祿七秩榮慶論集》，聯合報國學文獻館，1992年5月）。

④ 明治十六年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乙部開設演說。

此情形之下，有識之士建議宜在大學設置「古典講習科」，傳授研究史學、政治學而必備的和漢古典、歷史、文學等基礎知識，以培養繼承傳統學問文化的人才。

明治十二年，大學的綜理加藤弘之向文部省（即教育部）建議設置「古典講習科」，却被駁回。到了十四年，再次提出，才受到認可。於翌年五月，以附屬的名義，在文學院新設「古典講習科」。同年十一月又設置專攻漢文學的講習科。前者稱為甲部、後者稱為乙部。

明治十四、五年的時候，日本全國一時瀰漫著反潮流之保守主義的氣息。山路愛山記述當時的情況說：「長久蟄伏於鄉間的漢學先生再度受聘到師範學校、中等學校任教。沈潛於西洋萬國史的青年也爲了順應時流，回頭研讀起左國史漢。」^⑤

古典講習科的教師陣容有教授中村正直、三島毅、島田篁村，副教授井上哲次郎。秋月章軒、南摩羽峯、信夫恕軒、內藤恥叟爲兼任教授。講授的課目以四部、即經子史集與法制爲主。講課以討論的方式，一方面由教授講授漢籍，一方面則由學生輪流研讀。每個月提交一篇漢文的作文。

古典講習科的營運經費原本是向文部省申請經常經費，結果沒有許可，只好撥出學校的一部分預算來運用，因此經費非常拮据。再加上傾向西洋學術的時代風氣依然盛行，古典講習科甚難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在此狀況下，大學當局於明治十八年停止招收古典講習科的

⑤ 見山路愛山《基督教評論》（岩波文庫、頁六八）。